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研究<sup>\*</sup>

李淑娟 高兴

**内容摘要** 中国东北河流湖泊众多,丰富的渔业资源一直被日本所觊觎。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当局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将“移民满洲”确立为伪满“三大国策”和日本“七大国策”之一。在大批移民中有一种特殊移民,即渔业移民。日本以缓和国内沿岸渔民生存压力,“开发”东北丰富渔业资源为借口,向中国东北进行渔业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分为两阶段,即以大谷光瑞为代表的“自由渔业移民”和日伪政府主导的“渔农开拓团”。受制于渔业与农业间的冲突、医疗问题以及“退团”因素的影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活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日本 中国东北 渔业移民

DOI:10.13740/j.cnki.jiiohr.2024.01.010

移民侵略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伎俩之一。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人地矛盾问题突出。明治维新后,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率先实现工业化与近代化的国家,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日俄战争后,日本即开始向中国东北“旅大”地区“试点移民”。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更是推出作为伪满洲国“三大国策”和日本广田内阁“七大国策”之一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据统计,“截至1945年,日本共向中国东北移入农业人口约27万人”。<sup>①</sup>移民种类繁多,包括早期试验性质的“试点移民”,协助关东军围剿东北抗日武装的“武装移民”,也包括“国策移民”政策下为掠夺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的特殊移民,如渔业移民。

目前,国内学术界围绕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侵略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以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特殊移民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尚不多见,渔业移民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渔业移民是其移民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基于大量美方馆藏日文资料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原始资料,对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渔业移民活动进行梳理与分析,揭露其对中国东北资源全方位殖民掠夺的实质。

## 一、大谷光瑞的渔业移民“尝试”

中国东北地区河流湖泊众多,北部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镜泊湖、兴凯湖等河流湖泊,南部则濒临黄海、渤海,渔业资源十分丰富。近代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以及政府对渔业资源的重视,东北各地相继出现渔业公司,对渔业经营管理也趋于完备。日俄战争后,日本虽盘踞在旅顺、大连为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哈佛大学馆藏近代黑龙江资源史料挖掘整理研究(1906—1945)”(19ZDA22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问题日本馆藏资料挖掘整理研究”(18AZD028)结项成果之一。

<sup>①</sup> 李淑娟、刘宇梁:《“移民”还是殖民?》,《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

中心的“关东州”，但始终以“吞并满蒙”为侵略目标，依靠散布于东北各地的间谍组织、情报机构以及“满铁社员”，深入东北腹地展开大规模调查，作为东北地区重要资源的渔业，自然被囊括其中。

对东北各流域鱼类资源调查显示，“海鱼中，鲷鱼粗蛋白质含量为 18.96%、脂肪 1.91%、热量 95 卡路里，鲑鱼粗蛋白质含量为 23.66%、脂肪 1.63%、热量 106 卡路里，鳊鱼粗蛋白质含量为 12.96%、脂肪 1.45%、热量 113 卡路里；淡水鱼中，鲢鱼粗蛋白质含量为 16.98%、脂肪 2.56%、热量 91 卡路里，鲤鱼粗蛋白质含量为 18.20%、脂肪 2.12%、热量 94 卡路里，鳙鱼粗蛋白质含量为 18.44%、脂肪 2.22%、热量 96 卡路里”。<sup>①</sup> 由此看来，东北各流域的鱼类脂肪含量低、蛋白质丰富。另外，与牛、羊等陆生动物蛋白质来源相比，“即使在陆上资源枯竭的情况下，水产资源仍会保持生产特性”。<sup>②</sup> 因此，日本将东北渔业资源视为优质动物蛋白质重要来源。

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政府在伪满下辖各省、市、县、旗设置水产机构，基本掌控了东北各地渔业捕捞及贩卖权。尽管东北水域面积辽阔，但受渔民人数少、交通不便以及捕捞技术落后等因素影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水产品需求。因此，伪满时期东北地区水产物近半数通过“进口”来满足。资料显示，“1936—1939 年间伪满洲国水产物进口占比分别为 51.6%、65%、65.9%、70.9%，而在 1938—1940 年伪满洲国水产物进口地区中，日本分别占比 71%、75%、65%”。<sup>③</sup> 这足以看出在水产物供需方面，伪满洲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与此同时，受战争影响，日本内地沿岸各渔场发展陷入困境，乱捕现象频发，渔场趋于荒废，限制了渔业的扩大生产。

为此，日伪政府提出，通过对伪满洲国内“未开发”水域的利用，增加水产物产量，并对此充满信心。伪满哈尔滨水产试验场场长青木三雄表示，“若对未开发水域进行合理利用，其产量将是现有生产量的六倍”。<sup>④</sup> 日伪当局对东北渔业资源的调查数据显示，“东北地区河流、湖泊每平方千米捕获鱼类数量为 2.58 公斤，而作为日本国内最大湖泊的琵琶湖每平方千米捕获鱼类数量不足东北地区的三分之一。在水域面积方面，东北内水水域面积则是日本内水水域面积的 12 倍左右”。<sup>⑤</sup> 这些数据更加坚定了日伪当局进一步“开发”东北各水域的决心，“通过对未开发水域的利用，在保证伪满洲国水产物自给自足外，剩余水产物还可向其他国家输送，满洲国也将一跃成为水产物的一大供给地”。<sup>⑥</sup>

这些“未开发”水域多分布在偏远地区，交通极为不便，且受地理环境、气象等自然因素影响，因而日伪当局认为，“劳动力将成为实现水产物增产的主要方法”。<sup>⑦</sup> 如上文所述，日本内地沿岸渔场发展陷入困境，渔业人口过剩，若将其作为渔业移民入殖中国东北，不仅可解决其国内沿岸渔民生计问题，同时，也与伪满洲国“水产物紧急长久增产的国家需求”目标一致。因此，日本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的计划初具雏形。

最早提出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的是大谷光瑞。大谷光瑞名义上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第 22 世法主，另一身份却是著名的“探险家”，1902—1914 年间先后三次以“学术调查团”名义组建探险队，对印度及中国新疆、西藏等地文物进行盗取。他依仗在佛教界的权威地位，支持日本军部的侵华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谷光瑞先后在近卫文磨、小矶国昭内阁任职，极力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手段、扩大侵华战争。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大谷光瑞移居旅顺，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出谋划策。他在《满洲国之将来》一书中写道，“满洲国将来的人口必由我民族填充……以十年为期

① 「満洲水産の重要性：開発高度化の急務要望(三)」、『哈爾濱日日新聞』1941 年 10 月 10 日。

② 「満洲水産の重要性：開発高度化の急務要望(二)」、『哈爾濱日日新聞』1941 年 10 月 9 日。

③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局、1942 年、2 頁。

④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4 頁。

⑤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11 頁。

⑥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11 頁。

⑦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調査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9 頁。

限,执行一千万人的移民计划,此事对于满洲国的将来有莫大的关系”。<sup>①</sup>可见,大谷光瑞极力主张日本向满洲移民。

1934年,大谷光瑞派遣人员对中国东北松花江流域展开实地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制定了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的侵略计划,“拟定在五月中旬先移渔民五百户,人口约一千五百余。其划定渔业地区,以松花江、同江、黑龙江附近为中心,其首先移去之渔民,散住于松花江下游一带”。<sup>②</sup>在使用机器捕捞大量江鱼贩行全满的同时,计划以松花江鱼类为原料,积极建设“江鱼罐头公司”,向世界市场贩卖产品。而在渔民招募以及渔业所需器具方面,“五月间第一次移民,近已由大谷氏在日本募集完了,至渔业所需器具、制造罐头之机器及技师等,大体亦准备就绪,江边工厂用地,闻已由伪机关主管人员之手,卖与该移民团”。<sup>③</sup>此外,若此次渔业移民取得成功,大谷光瑞后续还会组织更多的渔业移民入殖中国东北。尽管各方面准备充分,但在渔业移民入殖松花江流域后,因捕鱼技术、鱼类加工、贩卖等各方面问题,此次渔业移民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居住在奉天的桥本文治以大谷光瑞的名义从青森县招募渔民15人,入殖“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合流处的海青镇”。<sup>④</sup>海青镇以出产鲑鱼而闻名,年捕获鲑鱼量30万—40万尾。桥本文治计划将捕获的鲑鱼出售给日本人和中国人,并加工制成盐鲑鱼运送至哈尔滨进行售卖。为此,1935年“从南满购得作为军需用品的粗盐5000吨,但因捕鱼工具及鱼类加工设备不足,只得从中国渔民处购买鲑鱼1.8万—2万尾,加工制成盐鲑鱼后运至哈尔滨售卖。但因在哈尔滨未能签署国际运输委托贩卖协议,加之大量盐鲑鱼腐烂变质,使桥本文治企图通过国际运输方式售卖盐鲑鱼的计划破产,1936年,15名渔民返回日本”。<sup>⑤</sup>

从整体来看,早期日本企图通过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的方式,掠夺东北渔业资源的成效并不显著。大谷光瑞渔业移民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无疑具有“试验”作用。上述渔业移民是在1934—1935年,此时伪满傀儡政府成立仅两年有余,日本向伪满洲国所在的中国东北地区入殖三次“武装移民”,而三次“武装移民”是以经营农业为主体,大谷光瑞渔业移民计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移民团体单一经营农业的模式,对日本移民侵略构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对于后期日本政府主导推出“渔农开拓团”及其侵略活动提供了借鉴。

## 二、日本政府主导的“渔农开拓团”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宣传中国东北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王道乐土”,实则处于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所谓的“内忧”,无疑是需尽快平息东北各地的反满抗日活动,进而加快对东北地区的侵略步伐,将东北作为其侵略战争的大后方、补给地。为加快对东北的“开发”进程,日伪政府于1936年8月推出“百万户移民政策”,1937年1月制定“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而“外患”则是指与伪满洲国接壤的苏联。因此,“出于对苏关系考虑增强军备,以及北边产业建设两者为目标”。<sup>⑥</sup>为达到“严守日满共同防卫、强化日满不可分关系,达到充实国内设施、开发产业、强化防共阵营”<sup>⑦</sup>的目的,日伪政府于1939年推出为期三年总金额达到十亿圆的“北边振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与“百万户移民政策”“产业五年计划”共同构成伪满洲国的“三大国策”。其计划内容除加

① 大谷光瑞《满洲国之将来》,大森社东京支部,1933年,267—268页。

② 《日人向松花江等处组设渔业移民团》,《东北消息汇刊》1934年第1期,第22页。

③ 《日人向松花江等处组设渔业移民团》,《东北消息汇刊》1934年第1期,第22页。

④ 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产业部农林课拓殖係《农业自由移民事情》,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1937年,31页。

⑤ 满铁产业部《渔业移民に就て》,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1937年,63—65页。

⑥ 木村增太郎《东亚新经济论》,投资经济社,1941年,76页。

⑦ 满洲事情案内所《满洲の策》,满洲事情案内所,1939年,6页。

强国防、修筑道路、增设发电设施外，“移民开拓”及水产物增产达到2.5万吨也被纳入其中。日本向中国东北北部的集中移民，“不仅具有突出的军事目的，还兼具经济、政治等意图，可谓一计多谋”。<sup>①</sup>

1935年大谷光瑞渔业移民计划失败后，日本向中国东北渔业移民的计划并未搁置，仍将此计划作为水产物增产的重要手段。同时，在“百万户移民政策”下，为完成大量移民入殖计划，“亦认为于其开拓民之拓殖计划中，有参入渔业者之必要，于是之渔业开拓团，从民国二十八年，接踵而来”。<sup>②</sup>在“百万户移民政策”和“北边振兴计划”背景下，日伪政府为达到“开发”和“水产物增产”目的，开始正式向中国东北地区入殖渔业移民。1939年，首批20户秋田渔业移民团先遣队入殖牡丹江镜泊湖流域，该移民团被视为“满洲首个渔业移民团”。<sup>③</sup>早在1934年，日本就曾向镜泊湖流域入殖“镜泊学园”移民团，还以“开发”镜泊湖中的渔业资源为目的成立“渔业组合”，并开始对鱼类进行加工制作。由此看来，将镜泊湖作为渔业移民入殖地，“镜泊学园”渔业活动的“早期经验”为秋田渔业移民团提供了借鉴。与大谷光瑞组织的民间渔业移民不同，秋田渔业移民团是日本政府从官方层面向中国东北派遣的有组织渔业移民。

1939年12月，随着《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出台，日本“移民”这一名称被废止，代之以“开拓民”。在该要纲出台前，无论是早期“试验移民”，还是伪满成立后向东北的“武装移民”，均以“移民”相称，但这一称谓已不符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更大规模殖民活动需要。正如1939年1月“日鲜满恳谈会”上第一、二次移民团团团长所言，“移民这一名称对于完成崇高开拓圣业的人们来说并不相称”。<sup>④</sup>“开拓民”成为日本“满洲移民”的替换词，不是简单的称谓改变，其实质是明确了散居于中国东北各地日本移民所肩负的特殊使命，提高了日本移民的“国策”地位；同时把侵略粉饰成“开拓”“开发”，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美化与歪曲。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对“开拓民”进行了重新区分，除“开拓农民”外，增设了由渔业、林业、畜牧业等行业组成的“半农开拓民”，以及商业、工业、矿业“开拓民”“青年义勇队”等，“渔业开拓民”被正式纳入“满洲开拓民”行列中。尽管该要纲没有明确界定渔业开拓团的相关内容，但渔业移民作为“半农开拓民”与农业移民共同组成“渔农开拓团”，并以此名义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资源掠夺。

日本于1939年向牡丹江镜泊湖地区入殖秋田渔业移民团后，又于次年相继向北满伪三江省、伪东安省以及南满伪安东省入殖“渔农开拓团”。截至1942年，共向中国东北地区入殖10处“渔农开拓团”，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表。

伪满时期东北各地“渔农开拓团”分布情况表

伪省份	入殖时间	入殖地区		名称	成员出身	计划移民户数	实际移民户数
		伪县名	地区名				
伪牡丹江省	1939	宁安	石头河	镜泊湖秋田	秋田、雄胜	50	30
伪三江省	1940.4	依兰	南舒乐镇	依兰桦太	桦太	50	29
伪东安省	1940.4	密山	白泡子	兴凯湖岛根	岛根	50	50
伪安东省	1940.5	庄河	庄河	庄河伊方	爱媛伊方村	50	39
伪东安省	1941	虎林	虎头	虎头新潟	新潟	50	—

① 李淑娟、刘宇梁：“移民”还是殖民？，《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

②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1948年，第41页。

③ 满洲国通信社「满洲国现势康德十年版」、クレス出版、1943年、76页。

④ 長谷川皓洋「满洲开拓の沿革と概観」、满洲移住協会、1942年、37—38页。



伪省份	入殖时间	入殖地区		名称	成员出身	计划移民户数	实际移民户数
		伪县名	地区名				
伪锦州省	1941.1	兴城	小英家屯	兴城亘理	宫城亘理乡	50	35
	1941.2	绥中	万宝山	绥中佐渡	新潟佐渡	50	29
	1941.4	锦县	大河口	锦县广岛	广岛	50	22
	1942	锦西	—	锦西陆奥	陆奥	—	派遣先遣队
—	—	青云	—	青云滋贺	滋贺	—	派遣先遣队

资料来源:根据开拓统计委员会「第壹次开拓团势调查报告书」、开拓统计委员会、1942年、299—300页;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41页;开拓总局「日本内地人开拓民入植现况」、开拓总局、1942年、11、13—14、41—42、47、59、62、63页相关内容编制。

由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向中国东北入殖“渔农开拓团”具有规模小、存在时间短等特点。除部分数据缺失外,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入殖“渔农开拓民”仅234户。“渔农开拓团”分布大体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北部内陆地区的淡水渔业地带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海水渔业地带,北部“渔农开拓团”主要分布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南部“渔农开拓团”则濒临黄海、渤海。由此可见,日本妄图实现对东北地区沿海渔业和淡水渔业“双重开发”目的。在“渔农开拓团”成员出身方面,秋田县、新潟县、宫城县地处日本东北部,冬季气候严寒与中国东北气候相似,这也体现出日本在“渔农开拓团”成员募集上的考量。在入殖时间方面,除“镜泊湖秋田渔农开拓团”外,其余大部入殖时间集中在1940—1941年,1942年虽组建“锦西陆奥渔农开拓团”,但也仅是派出先遣队。在实际移民户数方面,仅有“兴凯湖岛根渔农开拓团”移民户数达到计划户数。

根据《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的要求,同时为了“遵守必须兼营农业的方针”,<sup>①</sup>秋田渔业移民团改称“秋田渔农开拓团”。日伪当局仍以“经营农业”作为移民生产活动的主要要求,“渔农开拓团”并非是单纯“渔业开拓团”或“农业开拓团”,而是通过渔业和农业“兼营”达到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掠夺的双重目的,因而,“渔农兼营”也成为“渔农开拓团”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

在“渔农开拓团”成员招募上,伪兴农部和伪开拓总局的意见并不一致。伪兴农部认为,招募“直接目的是通过确保劳动力,实现水产物增产,劳动对象则是尚未被利用的水域和水面,并将日本内地高水平技术普遍渗透到满洲渔业中来,以提高渔业生产率,因此开拓民的资格应该是具备丰富渔业经验者,这是不言而喻的,间接目的是考虑粮食自给问题兼营农业”。<sup>②</sup>由此可见,伪兴农部提案主要是以水产物“开发”和“增产”为出发点,倾向于招募有渔业经验的成员。而伪开拓总局则主张“渔农开拓团”应由农民构成,“为了长久的住下去,必须爱这块扎根的土地……要使这种精神培养的更加牢固,那就要经营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sup>③</sup>在伪开拓总局看来,虽名为“渔农开拓团”,但与其他“农业开拓团”在经营农业方面并无二致,经营农业是“开拓团”的生存本位要义。最终,伪开拓总局的提案成为“渔农开拓团”成员招募标准,其成员大体由“渔民、农民以及部分有特殊技能者组成”。<sup>④</sup>实际上,为凑齐招募人数,不得不降低标准,“连同普通开拓民一样,只要是具有坚强的为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12页。

②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渔农开拓团》;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1989年,第98页。

③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渔农开拓团》;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第97页。

④ 《锦州市水产事情详解》;郭连强、金以林主编:《近代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汇编 第二辑经济调查》(4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开拓事业献身的意志的日本内地人都有资格参加”。<sup>①</sup> 这导致各“渔农开拓团”出现成员职业分布不均现象,具体情况如下表。

“渔农开拓团”成员职业统计表

“开拓团”名称	职业户数						合计
	农业	商业	工业	渔业	官公吏	其他	
镜泊湖秋田	9	—	—	3	—	—	12
依兰桦太	13	2	1	13	—	5	34
镜泊湖岛根	25	3	5	10	—	7	50
庄河伊方	16	1	—	3	1	2	23
兴城亘理	32	2	2	6	—	1	43
大河口广岛	5	5	8	12	1	1	32
万宝山佐渡	13	—	—	15	—	—	28
合计	113	13	31	47	2	16	222

资料来源:开拓统计委员会「第壹次开拓团势调查报告书」,318—319页。

上述统计显示,七处“渔农开拓团”中,近半数以上农业户数要远多于渔业户数,部分“开拓团”渔业户数仅占其总户数 1/7,而从总户数来看,渔业户数仅占 21.2%,农业户数占 50.9%。虽冠以“渔农开拓团”,但渔业和农业户数占比不均,导致“开拓团”渔业和农业经营不均衡,这也成为“渔农开拓团”失败的重要因素。

北满地区经营最好的“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经营就存在这方面问题。“团长”“中居市三郎原在库页岛从事渔业,后听说满洲乌苏里江抚远方面,鲑鱼捕获量达二十二、三万尾的好消息,决心对此进行专门开发”,<sup>②</sup>在对松花江流域实地调查后准备前往。《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出台后,为符合“半农半渔开拓团”要求,该团又纳入部分农民,组成符合要求的“渔农开拓团”,于 1940 年入殖伪三江省依兰地区,“其入殖时总户数为 38 户,其中农业户数占 21 户、渔业户数 17 户;总人数方面,农业人口为 122 人,其中男性 86 人、女性 36 人;渔业人口为 62 人,其中男性 42 人,女性 20 人”。<sup>③</sup> 从“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入殖时总户数来看,农业和渔业户数并无较大差异,但在总人数方面,农业人口则接近渔业人口 2 倍,占“全团”总人口的近 6 成。此外,在户平均人数方面,农业户平均人数为 6 人,而渔业户平均人数为 4 人,农业和渔业人数的失衡状态也为“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失败埋下伏笔。

“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团部”设在依兰镇,渔业经营区位于“依兰东部约 4 公里倭肯河注入松花江入口处,适宜渔船停泊,而农业地区则选择在距依兰县城东部 28 公里松花江下游舒乐河附近舒乐镇”。<sup>④</sup> “团部”、渔业捕捞地区及农业经营地区分布呈“三足鼎立”,不仅导致“开拓团”本部对渔农地区管理不便,农业和渔业地区分离,也使“开拓团”出现“渔民不懂农业耕作,农民不懂得渔业生产”<sup>⑤</sup>的局面。另外,因“团长”中居市三郎的关系,该“开拓团”以经营渔业为主,在资金分配方

<sup>①</sup>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渔农开拓团》;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第 96 页。

<sup>②</sup>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渔农开拓团》;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第 100 页。

<sup>③</sup>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に於ける漁農开拓团に就て」,21 页。

<sup>④</sup>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に於ける漁農开拓团に就て」,22 页。

<sup>⑤</sup>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满洲に於ける漁農开拓团に就て」,24 页。

面,“农业经费大部分被投入到渔业活动中,同时渔业活动中若出现亏损情况,还要向农业转嫁负担,还需向渔民提供粮食”。<sup>①</sup>由此,农业与渔业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的收支情况也证实了农业和与渔业的失衡。1940年“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支出总费用达20809圆,其中渔业费用为10646圆,农业费用为1672圆;收入总计为25277圆,渔业收入为11044圆。<sup>②</sup>支出方面,渔业支出占总支出半数以上,而农业支出则不足总支出两成。反观收入方面,渔业收入费用与其支出成正比,占总收入四成以上。上述收支情况印证了“依兰桦太渔农开拓团”渔业和农业“兼营”的失衡。

在渔业地区选址方面,南满地区“渔农开拓团”要比北满地区“渔农开拓团”更有利。南满地区五处“渔农开拓团”分布于沿海地带的庄河和锦州两地,捕鱼环境与日本相似,较为便利渔业活动。

位于伪安东省的“庄河伊方渔农开拓团”成员主要来自爱媛县西宇和郡伊方村,“1940年5月,该开拓团组成8人先遣队率先进入庄河,并雇佣在庄河当地精通渔业的日本人川尻。先遣队中的2人与川尻对当地海岸展开调查,其余6人则租用庄河街中国人房屋,并借用当地农民耕地种植蔬菜”。<sup>③</sup>通过对庄河当地渔业调查,先遣队决定以鲑鱼漂网作为主要捕鱼方式,为此准备了“机动船3艘、大舢板3艘、鲑鱼渔网3挂、定置网2挂,并借用距庄河县海面四里处大王家岛的中国人房屋作为宿舍。1940年8月10日该团开始第一次捕鱼活动。1940年捕获鲑鱼总价值为3000圆,1941年总价值则达到5000圆”。<sup>④</sup>

锦州地区则有四处“渔农开拓团”。锦州地处渤海北部,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日伪当局调查数据显示,“渤海地区每平方千米可捕获鱼类达8.2公斤,这一数字冠绝全满。同时因自然条件优越以及大连附近机船捕鱼业发展较好,因此有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sup>⑤</sup>尽管如此,“渔农开拓团”在实际渔业活动中,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以“兴城亘理渔农开拓团”为例,仅有七名成员从事捕鱼业,“1940年该开拓团渔业作业时长仅为三十余天”。<sup>⑥</sup>这表明该“开拓团”的经营模式已与“渔农兼营”完全背离。

渔业与农业间的“冲突”在南满各处“渔农开拓团”普遍存在。“庄河伊方渔农开拓团”以捕捞鲑鱼为主,作业时间集中在春、秋两季,而该季节恰好与农业耕种、收获时间重合,导致“庄河伊方渔农开拓团”在农业和渔业“兼营”中出现劳动力冲突。因该“开拓团”主营农业,渔业活动只得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进行。这成为“庄河伊方渔农开拓团”渔业捕捞活动趋于停滞的直接原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的扩大导致对物资需求剧增,因此日伪当局加紧对中国东北渔业资源的掠夺。日伪政府于1943年推出“水产物紧急增产对策与集货配给计划”并成立“水产物统制组合”,1944年又出台了《水产统制令》,旨在加强对东北地区水产物的统制与掠夺。资料记载,“1944—1945年东北地区水产物产量分别为119322吨和155145吨”。<sup>⑦</sup>日本在此时向中国东北入殖“渔农开拓团”,毫无疑问是将其作为掠夺东北渔业资源的主要力量。

日本企图通过入殖“渔业开拓民”达到“开发”东北渔业资源和完成“满洲农业移民”的双重目的,但鉴于当时各“渔农开拓团”渔业活动“发展”滞后的现状,1942年后便再未向中国东北入殖“渔农开拓团”。而散存于东北各地的“渔农开拓团”出于粮食自给及稳定生活和经济考虑,开始侧重经营农业,农业逐渐成为“渔农开拓团”经营主业。这导致东北各地“渔农开拓团”渔业活动经费逐渐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25—26頁。

②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29頁。

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32—33頁。

④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33頁。

⑤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36頁。

⑥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満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団に就て」,第37頁。

⑦ 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编:《东北经济小丛书·水产》,第52頁。

减少,渔业活动趋于停滞,最终导致“渔农开拓团”走向瓦解。

### 三、渔业移民失败原因剖析

移民是日本殖民中国东北的重要手段,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径。大谷光瑞渔业移民计划失败后,在“镜泊学园”等移民团内设置“渔业组合”,表明日本政府并未放弃对东北地区渔业资源的“开发”野心,直至1939年开始正式向中国东北入殖“渔业开拓团”。后根据《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的要求,渔业移民团更名为“渔农开拓团”,旨在“兼营”渔业和农业,但最终也失败了。分析其失败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渔业和农业的冲突。伪满洲国成立后,出于战争需要,日伪当局一直将“发展”中国东北的重工业视为重点,对重工业投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伪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总计投资61.6亿圆,其中“矿工业部门资金数额达到48亿圆,农业部门1.4亿圆”。<sup>①</sup>对农业投资微乎其微,农业部门仅占“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2.3%,而矿工业部门则高达77.9%。作为农业辅助产业的渔业,政府更是无暇顾及,在人员、资金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渔业经营的失败。而在“渔农开拓团”内部渔业和农业的冲突尤为突出。渔业和农业户数失衡,使各“渔农开拓团”内从事渔业和农业人数比例相差甚远。“渔农开拓团”宣称的经营模式为“渔农兼营”,但大部分“渔农开拓团”并未按此方式运作,其主营业务由“开拓团团团长”决定,与“开拓团团团长”以往的职业有直接关系,使得“渔农开拓团”中出现“营农”“营渔”以及“渔农兼营”三种经营模式,这间接导致渔业和农业在资金分配上严重不平衡。在渔业和农业经营问题上,渔业和农业人口分配不均,各“渔农开拓团”内主营行业不同,加之在东北经营渔业的种种困难,使原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的渔民数量锐减。最终导致“满洲的渔农开拓民在开拓第一阶段完全丧失了水产物扩大生产的意义……虽冠以渔农开拓民的特殊称谓,但与一般农业开拓团已无任何差异”。<sup>②</sup>

(二)医疗问题的困扰。若将渔业与农业间的冲突,视为限制“渔农开拓团”的阻力因素,医疗问题则成为影响“渔农开拓团”“发展”的最大障碍。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气候差异较大,渔业移民入殖地均地处偏远,多为“未开发”地,医疗问题一直是“困扰”日本当局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关键因素。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入殖移民分为“集合开拓”和“集团开拓”两种,“渔农开拓团”属于“集合开拓”。日本仅在“集合开拓团”的“伪吉林省舒兰、伪三江省桦川、伪滨江省阿城、伪通化省辉南设置6处医院或诊疗所”。<sup>③</sup>“渔农开拓团”内并未专门设置医院或诊疗所,医疗问题成为困扰渔业移民的重要问题。“1941年初,因大王家岛水质不良,庄河伊方渔农开拓团先遣队中4人患上阿米巴痢疾,捕鱼作业困难,再加之来岛接丈夫的女人又出现患病死亡情况,以及在后续捕鱼作业中遭遇风暴袭击,渔网损坏,捕鱼业出现危机。”<sup>④</sup>另据资料记载,“1940年部分渔农开拓团死亡人数为4人,其中幼儿3人;1941年死亡人数为6人,其中幼儿4人”。<sup>⑤</sup>医疗问题不仅影响“渔农开拓团”的“开拓”经营,幼儿的死亡更对“渔农开拓团”成员心理造成致命打击。

(三)“退团”问题。大批“开拓民”来到中国东北地区后,不仅面临水土不服、思念家乡等困难,还经常遭到抗日武装袭击,因此“退团”事件时有发生。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入殖的“第一次武装移民”中便有大规模“退团”事件发生。“1940年,镜泊湖秋田渔农开拓团成员因品行

① 木村增太郎「東亞新經濟論」、投資經濟社、1941年、46頁。

② 開拓統計委員會「第壹次開拓團勢調查報告書」、39頁。

③ 開拓統計委員會「第壹次開拓團勢調查報告書」、374頁。

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局「滿洲に於ける漁農開拓團に就て」、33頁。

⑤ 開拓統計委員會「第壹次開拓團勢調查報告書」、376、378、379、380頁。



不佳或受疾病等因素影响,退团户数达到 10 户”<sup>①</sup>;1941 年,“因成员思想不坚定及个人因素退团户数达到 16 户,至 1942 年,该开拓团仅剩 12 户”。<sup>②</sup>早在 1936 年,“镜泊学园”就曾在镜泊湖地区成立“渔业组合”,为“镜泊湖秋田渔农开拓团”提供了经验,尽管如此,该“开拓团”内仍有大规模“退团”事件发生,其他“渔农开拓团”的情况也大致类似。与“农业开拓团”相比,“渔农开拓团”本就存在人员少、分配不均等问题,“退团”事件的出现使“开拓团”内部劳动力严重短缺,导致渔业和农业经营矛盾更加突出。

纵观伪满时期日本向中国东北入殖渔业移民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早期大谷光瑞自由渔业移民的“尝试”,以及在“百万户移民政策”和“北边振兴计划”时期入殖“渔农开拓团”。大谷光瑞自由渔业移民属个人行为,日本政府并未对其进行资助与支持,呈现人员少、时间短、成效差等特点。大谷光瑞的自由渔业移民亦可看作是日本向中国东北进行渔业移民的“试验”。而后,日本政府主导的“渔农开拓团”,是在伪满出台“百万户移民政策”和“北边振兴计划”背景下实施的,从“渔农开拓团”计划制定、成员招募、入殖地选择、先遣队派出,再到入殖后渔业和农业活动展开,无一例外,均受到日本政府及相关机构特殊“关照”,也正因如此,“渔农开拓团”成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及掠夺渔业资源的重要力量。

整体来看,渔业移民在日本“满洲移民”政策中虽不处于核心地位,在规模、人数及经营模式方面无法与“农业开拓团”“林业开拓团”“铁道自警村”等移民团体相提并论,但仍是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企图通过向中国东北入殖渔业移民,一方面对东北地区广阔水域进行“开发”,减缓其国内鱼类出口的压力,对东北渔业资源进行掠夺;另一方面,将其国内沿岸渔村剩余劳动力以渔业移民的形式入殖中国东北,在转嫁国内危机的同时,拓宽了“满洲移民”种类。渔业移民的出现,既显示出日本“满洲移民”政策的“广度”,也凸显出日本对中国东北各行业渗透的“深度”。

随着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散布于中国东北的“渔农开拓团”也随之瓦解。历史证明,世界各国人民可以自由友好往来,促进各种文明交流与互鉴,但带有侵略性、殖民性的“政治移民”,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李淑娟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高兴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潇洋)

① 开拓统计委员会「第壹次开拓团势调查报告书」,330 页。

② 开拓统计委员会「第壹次开拓团势调查报告书」,303、330 页。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rganized a series of organizations of united front to mobilize the public such as the National Salvation Society for the Resistance of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Political Training Office and the Mobilization Committee, which reorganized the mass organizations from top to bottom,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squires, landlords and peasant cadres, and promoted the enthusiasm of all sector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 invasion. In the 1940s, with th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Security Intensification Campaign"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CPC sent a government-civilian working team to carry out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established the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 of poor peasants and peasants' federation to weaken and fight against the forces of landlords. Then the CPC timely turned to the production movement, guided the peasants to set up groups of mutual support and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which stabilized the basic order of rural society. The CPC constructed a mechanism for mobilizing the peasants, which promoted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ata and farmers' daily life in the border area of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and reconstructed the rural landscape of the peasants in the interweaving of modernity and localism.

**6. A Study on Japan's Fishing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sup>th</sup> Incident ..... Li Shujuan Gao Xing(77)**

There are numerous rivers and lake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abundant fishing resources were always coveted by Jap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the Japanese puppet authorities established "immigrating to Manchuria"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National Policies" of the puppet state and one of the "Seven Major National Policies" of Japan. Among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ishing immigration was a special type. Japan used the excuse of easing pressure on coastal fishing villages and "developing" abundant fishing resources in Northeast China to initiate immigration. The Japanese fishing immigration proces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namely, the "Self-employed Fishing Immigrant" represented by Otani Kozui and the "Development Group for Fishing and Agriculture" led by the Japanese puppet government. However, due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fishing and agriculture, medical issues and the withdrawal of immigrants from the Development Group, Japan's fishing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ended in failure.

**7. UK's Containment and Indulgence towards Japan during the January 28<sup>th</sup> Incident ..... Xiao Ruping Li Hongze(86)**

On the eve of the January 28<sup>th</sup> Incident, to maintain the safety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cession, the UK collaborated with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to develop *The Joint Defense Plan*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Conces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ciden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ternational Concession from becoming a battlefield of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UK